

山西介休

发现的几块重要碑刻

□ 师又源

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山西介休后土庙古建筑群维修工程中,在后土庙大殿的地下,发现了两块叠压在一起的碑刻——《创建献楼之记》和《重建后土庙碑》。这两块碑刻的发现,确定了献楼和后土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对于了解后土庙古建筑群逐步形成的过程和解放前后土庙古建筑群惨遭破坏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九四五年,阎锡山部三十四军驻防介休,军部设在后土庙东毗连的纯阳宫、关帝庙。军长高倬之积极配合阎锡山的“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的“肃伪”恐怖政策,拆除了后土庙大殿的献亭、东西配殿,捣毁了大殿、朵殿(三官祠真武殿)配殿以及献楼二层(三清阁)的全部塑像。利用后

土庙大院修建了“自省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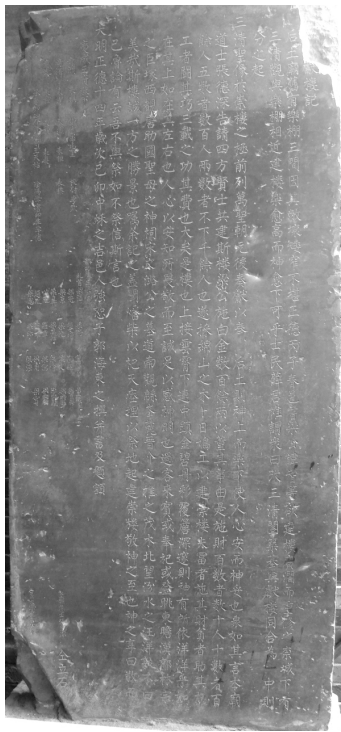
解放后,山西省人民政府将后土庙古建筑群(包括现在两条中轴线上的所有建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碑刻丢失,无法确定始建年代。

《创建献楼之记》碑,通高 192 厘米,圆形螭首,高 82 厘米。额题“创建献楼之记”。碑立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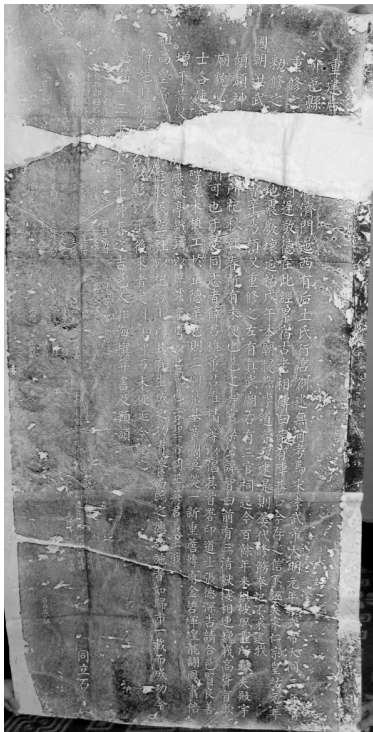
碑文中称“后土庙旧有乐棚三间,因其敝坏矮窄不堪,正德丙子春,邑梁公讳智等,欲建楼广阔而重修之,奈城下有三清观与乐棚相近,建楼乐愈高而神愈下,可乎?士民薛君雄谓众曰,改三清阁筑基与献楼同合为一,中则分之起三清圣像,于崇楼之极,前列万圣朝元,后奏献以奉后土,则神上而乐下使人心安而神妥矣……”。

这说明创建献楼是因重修后土庙的乐棚引发的。乐棚与城下三清观相连,如果将乐棚改建为乐楼,则它的高度超越了背后三清观圣像的高度,这对神是大为不敬的。所以将三清观大殿和后土庙乐棚合二为一,创建了献楼。在楼的二层又塑了一组三清圣像(三清观原有两组三清圣像,一组在大殿内,一组在楼上,后毁于解放前),解决了神上乐下的矛盾。

献楼的形制集歇山、悬山、硬山于一体,将大殿、楼阁、舞台、影壁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设计精巧,在山西这座古建筑宝



图一 《创建献楼之记》碑



图二 《重建后土庙记》碑

库中别具一格。无独有偶,在介休市顺城关大街东尽头,三结义庙的乐楼(祆神楼)和献楼的形制相同。但祆神楼的高度、体量、知名度,远远超越了献楼,是山西三大名楼之一。可以说,献楼和祆神楼的设计是互相借鉴的。不管是谁模仿谁,它们均为我省琉璃楼阁艺术建筑的双璧,是介休历史文化辉煌的载体。

《重建后土庙记》碑,通高1.81米,圆形螭首高84厘米。额篆书题“重建后土庙记”。

碑文载:“介邑□□□□□润济门迤西,有后土祠行宫,创建无可考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梁武帝大同二年皆重修之……宋仁宗皇祐元年敕修之,□□□□(应为大德□卯)地震毁坏,延祐戊午本庙提点李道荣复建,……我国朝洪武……又重修之。左有真武庙,又有三官祠,迄今百余年来,俱被风霾所蔽,殿宇倾颓,……秋报春祈,有未便也。邑之寿官梁公讳智曰,前有三清献楼相连,巍峨高耸,有欺庙貌,必□□□□可也……植工于正德辛巳则三庙筑基,广阔,焕然一新。”

根据碑文中后土庙历朝历代维修的记录,证明后土庙还应保存有明正德前历代维修的碑刻,现已荡然无存了。但应该相信,后土庙始建年代的久远是肯定的。

献楼竣工后,后土庙的主殿愈加相形见绌,重建大殿,已成必然。但后土庙大殿的面阔不够,将左右的三官祠、真武庙三而合一,设计构建了现在重檐歇山,左右各带三间廊房的大殿。创建献楼和重建后土庙大殿及大殿前的献亭,完成了从三清观影壁、山门、护法殿、献楼、后土庙大殿这条中轴线。《创建献楼记》中有:“…奈城下有三清观相近”之说,可见创建献楼和重修后土庙大殿时有城墙的障碍。如果不拆除城墙,工程就无法进行。明正德时,介休城的城墙是土城,直到明隆庆年间才改建为砖城。砖城城墙从东至西的走向,应在献楼和大殿的院中通过,可它围绕后土庙大殿作┐形的转折。按常理古建筑可建在城里,也可建在城外,这种城墙随庙转弯的情况,是在改建砖城前,创建献楼和后土庙大殿造成的,在古建筑模式中是个孤例。

《重建后土庙记》碑所记的“……复□□□虎献亭,铁铸以醺炉香鼎,以壮观也。”这些明正德

时铁铸的醺炉香鼎,在上世纪40年代初,日伪统治时期,还陈列于三清观山门和影壁之间。当时三清观后土庙被第三新民小学占用,时任校长将醺炉香鼎卖掉,给学生作了秋千、滑梯。醺炉香鼎是为后土设置,说明原来后土庙和三清观只有一个山门。

后土在道教神祇中,位置在三清之下,是四御之一,主管宇宙、土地、日月星辰、生灵万物。封建皇帝所讲的“社稷”,“社”即土地,“稷”是粮食。没有社稷就没有国家。不仅群众敬奉他,皇帝也年年祭祀他。所以,三清观和后土庙同设一个山门,是对后土的不敬;在道教的等级上,三清在后土之上,后土庙大殿占了中轴线上的主位,也有尊卑颠倒之嫌。

从三清观影壁“道光十五年”题记和后土庙琉璃影壁“张仁德造”的题记,可以说三清观的影壁及三清观东、后土庙影壁、山门、娘娘殿以及娘娘殿西,后土庙旁门(也毁于解放前),均为道光十五年新建的,同时,三清观、后土庙也进行了大修。可惜明正德以后的维修,及道光十五年大修的碑记都没有保存下来,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历朝及民国的《介休县志》也没有记载。只有《创建献楼记》、《重建后土庙碑》及道光十五年琉璃影壁的题记,记录了后土庙古建筑群形成的过程。

唐贞元十一年《法兴寺》碑和金天会十四年《重修殿记》碑。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介休洪山村西南,黄土丘陵上,农民耕地时挖出一块“唐贞元十一年,法兴寺四至及地产”碑(图三),金天会十四年洪山寺《重修殿记》(图四)两面碑刻。碑呈圭形,高95厘米,宽55厘米,厚19厘米。现藏于介休市后土庙献楼下。

《法兴寺》碑记录了法兴寺四至及水磨、煤窑及地产。並涉及到洪山村法兴寺附近的地名及佛寺,更重要的是透露出法兴寺附近“琉璃寺”的佛寺名称,反映出介休地区古建筑屋顶上使用琉璃的下限年代。兹将碑文抄录于后。

“窃以成住坏空,古今兴废,是□常道。本寺□识恐□移失,议立碑文,开列于后。法兴寺四至,东至刘家山,南至沙河沟,西至麻儿沟,北至



图三 《法兴寺》碑

樊王道。洪□寺窠一所,东至焦家山,南至沙河沟,西至麻儿沟,北□至段顺祖□,西至李德玉,北自至。神峯北地一所,东至大烟头,南自至,西至琉璃寺。北至石佛脚,神峯南,洪耀庄东紫林两处。洪师道场,石佛堂,麻地一段,记地三亩七分,东北至大河,南至道,西至贾天祥。两水教村西北庄子一所,记地一顷八十亩,东至贺秀,南至段顺祖,西至李德玉,北至大河。崇贤村庄子一所,记地一顷七十亩,东至道,南至张文俊,西至永润村宋祐,北至华门沟。木□庄炭窑一分,源神后水磨一分,堡和沟水磨一分。本村观音堂地一所,内水碾磨两盘,东至沟心为界。南西北至道。

当寺僧四十众,下院武同村大觉院大约地两顷,两神村圆照庵大约地两顷。

时大唐贞元十一年 月 日恒灯立石。石匠仇四义”

《法兴寺》碑的背面为金天会十四年(1136年)洪山寺《重修佛殿记》碑文中称,“……天会十四年,庚午岁,……古殿梁栋年深,基□□残,木质烂朽,虑其颓毁,伤损尊容,遂乃共议商量,垂□修盖。”竣工后又有“……溪风紧攢,梁立峥嵘,倚天□□昂飞,盘旋翳目,椽铺玳瑁,瓦甃琉璃……”的记叙。

根据碑文的描述,证实了重修大殿的屋顶上使用了琉璃,而且在木椽前的横截面上,还装饰



图四 《重修殿记》碑

了琉璃的饰件,现在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围廊的木椽和飞椽的截面上,就装有琉璃烧制的狩头,这种手法,在金代天会时已有之。

介休的洪山地区,有丰富的水源和煤炭瓷土资源,唐代洪山地区瓷窑的窑址就在法兴寺附近。琉璃为低温铅釉陶,和唐三彩是近亲,在唐代,河南的巩县,陕西的铜川和西安附近,就已经烧造出了绚丽多彩的唐三彩,在铜川的黄堡镇还出土了唐三彩的建筑构件。

《法兴寺碑》“西至琉璃寺”的记载证明了在自然物质条件优越的介休洪山地区最晚在唐代贞元时已经开始烧造琉璃,并使用到古建筑屋顶上。到金天会时达到极盛,将介休地区烧造琉璃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也是我国古建筑中使用琉璃最早的实例。

唐《法兴寺碑》中所列的地名、佛寺还给介休洪山地区的考古,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法兴寺碑》中,记载有法兴寺的地产。“两水教村西北庄子记地一顷八十亩”;“崇贤村庄子记地一顷七十亩”;“武同村大觉院大约地两顷,西神村圆照庵大约地两顷。”四至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在其内。总计土地七顷五十亩。只有四十个和尚的佛寺(当寺僧四十众)即占有这么多的土地,可见

(下转 52 页)

选人间,分别善恶,诸天圣众,普诣宫中,简定劫数,人鬼传录,饿鬼囚徒,一时皆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献于玉京山,采诸花果,珍奇异物,幢幡宝盖,清膳饮食,献诸圣众。道士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俱饱满,免于众苦,得还人中。”《艺文类聚》所称道经乃《太上洞玄灵宝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

《道藏》收入洞玄部本文类。该经有题解和注释,作者不详。注称:“三元者,元,本也。但以上三官为万物之行本,故曰三元。”题解称:“一切众生,生死命籍,善恶簿录,普皆系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毫分无失。所言三元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即天官检勾;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即地官检勾;十月十五日为下元,即水官检勾。一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之所统摄。”

宋代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签》卷五十六《元气论》是这样论述“三元”的:“混沌分后,有天地水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人亦法之,号

为三焦、三丹田,以养身形,以生神气。”将人体的三丹田称为“三元”是道教内丹术的说法。

3. 传统的“三元”为一年的三个传统节日,分别是“上元(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日)”,“中元(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或‘鬼节’)”,“下元(农历十月十五日)”,分别指三组日排列之起点。

综合以上旧说分析,“三元甲子”瓶的最真实含义应该是祈求人生长生不老,这无疑与道教中灵魂不灭论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在宋元时期,我国佛、儒、道三教已经合流,文化的繁荣使普通百姓墓葬的营建、随葬品的级别有了很大提高,“三元甲子”瓶出现在墓葬中与此当密不可分。当然,对于后世子孙在仕途功名上的企盼也是有这方面的意思在里面。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民俗博物馆)

(上接 58 页)

唐代佛教的兴盛,僧侣的富有。唐代的佛教,由于初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到贞元时达到极盛。在唐代浮屠法规定,寺院的土地不缴纳赋税,僧侣更不服徭役。这种情况,在盛唐经济发达时期,和唐中央政权,财政收入的矛盾,还不明显,但随着佛寺的不短发展,地主善士的捐赠,土地更大量流入佛寺,开元时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经济衰退,人口减少,佛寺和唐中央政权,赋税收入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贞元(785年-804年)50余年后,唐

武宗即位的会昌五年(845年):“废浮屠法,诏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武宗“会昌灭法”。这次灭法可能法兴寺也未能幸免。《法兴寺碑》所反映的佛寺土地的占有,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介休市博物馆)